



# 故人·故居·故事

张映勤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天津卷



故人·故居·故事

张映勤 著

天津卷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故人·故居·故事：天津卷 / 张映勤著.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1  
ISBN 978-7-202-11540-4  
. 故... . 张... .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近代 . K820.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8101号

---

书 名 故人·故居·故事：天津卷  
GUREN GUJU GUSHI TIANJIN JUAN  
著 者 张映勤

---

责任编辑 贺秀红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赵 健  
责任校对 余尚敏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2 000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1540-4  
定 价 43.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 录

---

001 / 惊世怪才梁启超

028 / 传奇李叔同

048 / 溥仪在天津

071 / 官场高手徐世昌

088 / 直系总统冯国璋

---

104 / 贿选总统曹锟

125 / “六不”总理段祺瑞

146 / 张勋戴发效孤忠

175 / 外交奇才顾维钧

200 / 花花公子张学良

---

216 / 奉军辅帅张作相

228 / 吉鸿昌天津遇刺

243 / 舍身成仁张自忠

260 / 南开之父张伯苓

278 / 戏剧天才曹禺

293 / 德艺双馨马三立

---

305 / 后 记



## 惊世怪才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的角色太多，贡献太大，很难用一句话来准确地概括，集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等于一身，一生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可谓五百年来难得一见的惊世怪才。

梁启超的独异之处，在中国近现代文人中无人比肩：23岁时与康有为入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24岁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名声噪起，26岁参与“百日维新”。事败后出逃，流亡海外14年，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进入袁世凯政府，41岁任司法总长、造币局总裁，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极力反对，后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在当时的政治舞台始终扮演重要的活跃角色。1929

年因误诊去世，享年56岁。

一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廿六（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他聪颖过人，被誉为“神童”，“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

光绪八年（1882年）初，9岁的梁启超随父亲参加县试，获第一名，博得才名。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16岁，参加乡试，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的科举之路，在其少年之时就已经完全展开，而且前途似乎无限光明。在他16岁中举之前，辉煌的成绩彰显的无疑就是他出众的才智和深厚的国学积淀。事实证明，梁启超并非一个一心为了仕途皓首穷经的腐儒，无论他在成长过程中有过怎样的思想变化，他的治学与思考，都是以改造社会、振兴民族和国家这样的抱负为方向的。然而结合他所处的晚清历史背景，政府对外腐弱无能，对内压制禁言，梁启超终究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在中举之后，他又参加过前后5次会试，至少两次已被录取，但终因其所述思想切中时弊，为当权者忌讳而被撤销名次。

这样的遭遇，一方面阻断了梁启超在晚清政坛仕途上的晋升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却也催生出了这位之后撼动乾坤、引领时代潮流的政治文化巨匠。

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启超在会试落第后返回家乡，期间结识了康有为。康有为向他痛陈朝廷腐败以及西方的救国救民之理。梁启超听后深感自己的知识浅薄，当即拜康先生为师。这对儿后来史称“康梁”的师生搭档从此结缘。此后几年间，梁启超与其他维新派有志之士兢兢业业、倾注心血传播维新思想，办学、办报、著书立说、组建社团，为政府官员建言献策，以所有可行的方式推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

终于，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以救国图强的革新设计和坚强不屈

的热血激情，打动了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康梁被皇帝授予职权，放手开展维新变法，25岁的梁启超被光绪皇帝赏六品顶戴，从此声名鹊起。君臣共同希冀着泱泱天朝从此能在他们的手中起死回生、重新崛起。可以说，此时的康梁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状态。

然而后来的历史，现在回首每每令人怅然叹息。这场短命的“百日维新”，始也迅猛，败也突烈。康梁大才，终究不过是书生文士，博学见识，挡不住铁血权术。戊戌政变爆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联手袁世凯这样的政治投机者反扑镇压，六君子血洒京师，康梁远避东瀛。

戊戌变法，成为维新派的历史绝响，也是康梁心中永远的遗憾。在此后的政治生命中，梁启超虽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始终忠君保皇，然而还是长久地抱有君主立宪制的幻想。但这样的幻想也并非梁启超的凭空痴念，他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有接触，并曾游历日本、大洋洲、美洲各国，反复思考中国的出路。从他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得出的判断是：中国没有条件实行共和体制，还是君主立宪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决定他作出如此判断的，有他对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政府的眷恋，也有他对不通过激烈暴力方式实现国家平稳转型、迅速复兴的梦想。他策划过自立军勤王，寄希望于光绪帝；协助过清政府迫于无奈的预备立宪，苦苦等待慈禧太后和她的继任者摄政王载沣能够实现立宪、召开国会；甚至在辛亥革命期间，试



惊世怪才梁启超



光绪皇帝

图依靠兵谏和政变掌控清政府。即使之后他对清廷彻底失望，放弃君主立宪，转而有限地支持革命和共和制，梁启超的政治运作始终无法突破其局限性。在袁世凯窃得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以后，他受邀入阁协助，同床异梦地做了一阵司法总长、造币局总裁，终不得志，请辞离去。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妄想称帝，梁启超联合蔡锷等人发动护国运动，成功恢复民国后，却又将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了段祺瑞，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幻想寄托在军阀身上。后来恶果显现，先是张勋复辟的闹剧，之后是北洋军阀内战不休，即使梁启超再次入阁参政，终究无力回天，徒呼奈何。

纵观梁启超一生的政治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特色贯穿始终。在戊戌变法前，这种特色体现为引领时代思想潮流、启迪政治变革构想。而在戊戌变法后，这种特色就阻碍了他作出正确可行的大势判断，使他始终拘泥于上层建筑，幻想单独依靠自上至下实现变革，而不是相信依靠基层民众。

离开段祺瑞内阁之后，梁启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治学写作和

舆论宣传上，积极推动知识分子新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中，梁启超应邀以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民间代表的身份赴巴黎联系各方，维护中国权益。在得知政府计划出卖国家主权后，他竭尽所能呼吁请愿，阻止国权丧失。而这也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此后，梁启超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治学著书中去，然而国内历次大的政治



康有为

波动诸如曹锟贿选总统、五卅惨案等，他都不避艰险地站出来，以各种方式争取正义公理。

## 二

梁启超以其对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推动和在思想、教育、学术等各个领域的巨大成就而被后世追思敬仰。他在国内长期居住过的多处寓所故居，都被国家和当地政府设立为文物保护建筑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以维护展示，以此来缅怀这位民族志士、文化巨匠，继承发扬他的爱国情怀和伟大人格。

梁启超故居散落于全国多地，包括北京、天津、佛山以及他的老家广东新会等地。他在天津的故居，位于现在的天津河北区民族路。其中包括两座建筑，44号为寓所主楼，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紧邻的46号为梁启超的书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饮冰室”，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5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从日本神户乘船回国。11月16日，梁启超终于抵达天津，再次踏上祖国的大地。天津方面的热情接待出乎他的意料，直隶都督冯国璋听说梁启超抵达天津，马上派人远迎。梁启超后来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

“赴共和、民主两党欢迎宴会及演说会，又地方官纷纷请宴，应酬极苦……无一刻断宾客。”苦虽苦矣，然而对于当时终于从戊戌变法的惨痛失败中走出来，再一次奋起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梁启超来说，天津这座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给他的第一印象无疑是非常热烈而充满美好憧憬的。

然而历史证明，梁启超的憧憬，美好而脆弱，最终幻化为泡影。他的政治追求和严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可能实现其在中国建立政党政治和共和国体的理想，只能从文化革新、开启民智上做一点最基础的工作。于是，他想寻求一个安静而条件优越的地方，安心做学问，并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但梁启超关心政治的本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他还是不



惊世怪才梁启超

希望离北京政治中心太远，便很自然地认定将家安在天津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于是他筹集资金，于1913年底至1914年初，通过朋友的帮助，在过去天津的意租界西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购买了一块约四亩的空地，准备修建寓所和书斋。意租界工部局当时有严格的规定，租界内建房样式不可雷同，要与周围的景观协调，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一年后，一幢具有意式风格的小楼建成了，梁启超一家搬入。

前楼，梁家人称为老楼，外墙由水泥浇筑，塑有花饰，院内建有花园、汽车房、传达室。通过石砌高台阶进入老楼，一、二层各有9间居室。整体建筑分为两部分，东半部为梁启超自己专用，有小书房、客厅、起居室等；西半部是家属住房。后楼为附属建筑，有厨房、锅炉房、贮藏室、佣人住房等。前楼与后楼有走廊、天桥连接。整所建筑为砖木结构，水泥罩面，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

1924年底，梁启超又在居室右侧，建起了风格典雅又富丽堂皇的“饮冰室”书斋。楼有二层，带半地下室，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建筑构图自由活泼，建筑形式为罗马式风格。楼前是花园式庭院，中间有一大花坛，以甬道围绕，南北两侧种植着藤萝，衬着淡素的透空花墙，显得幽雅宁静。从门廊进入大厅，顶部有彩色玻璃的藻井，地面以大理石铺砌。一楼设有大厅、书房、资料室、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客房、餐厅等，梁启超晚年的政治活动和写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所楼与之前建成的梁启超寓所的设计大相径庭，虽同为意式建筑，但折中主义风格明显，设计也富有个性，这与当时欧洲的流行设计风格有关。

“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

冰”方能得解。所以，他正是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焦灼。其实早在他流亡日本时的书斋就号为“饮冰”。而天津这座书斋的建成，意味着梁启超曾经虚拟的“饮冰室”文化符号终于有了实体的依托。

自1919年至1929年，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坛，除了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讲学和开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寓所及饮冰室书斋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外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这一时期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梁启超在天津居住多年，“待客谦恭热情，每逢寒暑假‘饮冰室’又变成补习学馆，有很多清华、南开的学生到这儿寻求知识”。

在天津，梁启超度过了他最后14年波澜壮阔的人生岁月。他与蔡锷将军共同策划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他主持国家制币局，推行金融币制的改革；他受聘于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与严复、胡适等学者名流过从甚密，成为挚友，更评史论政，潜心研究学问，为后人留下了“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的浩如烟海的文字著述。



惊世怪才梁启超

### 三

自从1915年，梁启超在天津意租界的全新寓所建成，举家迁入，至1929年初他因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直至最终病逝，笼统算来，梁启超在天津生活工作了14年。然而这期间如果除去他在北京北洋政府中任职从政、奔波各地主持参与历次政治军事活动、出国参加巴黎和会、在清华大学任教、赴全国各地讲学演说以及在北京、北戴河等地治病疗养等等时日，其实他真正驻足天津寓所的时光，要打不少折扣。

然而梁启超毕竟是见识过人、眼光独到，他选择天津作为自己及全家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并不惜投入巨大的资金、精力，在租

界一砖一瓦地营建起住所和书楼，绝不会是简简单单地心血来潮随性为之。后来的事实证明，天津寓所尤其是“饮冰室”，在梁启超后期的政治生涯及学术生命中，为它的主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支持，当之无愧地成为梁启超一家人的避风港和后花园。当然谁也无法否认，无论是20世纪初期甚或时至今日，从事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和天津比起来，北京都有着太多的优势。但具体到梁启超的需求考量，天津的一些特点就凸显出来了：天津无疑也是近代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几座城市之一，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生活设施建设完备，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北京、上海，交通、通信等对外联络极为便捷，这对每周都要和国外读书的几个儿女保持书信往来、包裹寄送甚至资金传递的梁启超来说无疑非常重要。与北京相比，天津的政治地位要逊色不少，这也就使得天津受到北洋军阀混战所引发的政局动荡波及要轻得多，寓所所在的外国租界，不可否认在当时的中国，治安还是相对更有保障的，后期的梁启超尤其是在辞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之后，能够静下心来著书立说过生活，即得益于此。

近代的天津，自身的教育发展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以张伯苓为首的一批教育家在天津的积极开拓，以南开系各级学府的建设发展成果，使后期以育民启蒙为己任的梁启超拥有了宽广的用武之地。当然，距离北京这个国家的心脏如此之近，往来如此之快捷，也肯定是天津的一大优势。梁启超毕竟是整个中国的梁启超，无论现实给他多少打击挫败，每一次国家危急之时，总不能少了他的声音和身影，从护国运动到打倒张勋“辫子军”复辟，都少不得他登高一呼，引领众人征讨逆流，而天津的这处居所每每充当了其征程的起点和运筹帷幄之地。

其实总结起来，梁启超在天津寓所和“饮冰室”中做的事情不出这两个方向：护权保国、著述治学。

护权，一是护国家主权，一是护国人民权。这里说的“保国”，并非狭义地保卫国家领土和家园安定，而是指挥卫民主、保护新生的国体政体。这其中梁启超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1915年至

1916年发动的护国运动了。梁启超的政治生命，无论成败，总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兴旺为出发点和宗旨目标的。他一生不喜暴力流血，但时局所需，他也从不退缩，这恐怕是“戊戌



梁启超

政变”带给他的血的教训和痛的成长吧。而决定这次运动成败关键的起点，都是梁启超的天津寓所。

1915年初，日本政府利用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二十一条”条约，企图以此攫取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特权利益。而早在心中憧憬“中华帝国”已久的袁世凯，此时更加心猿意马，在诸多虚假的共和烟雾下，紧锣密鼓地与日方展开秘密会谈，打算找个最划算的价码就出手，不惜出卖本已支离破碎的国家主权，以换取自己的一袭龙袍、一顶皇冠。

这时的梁启超已经对袁世凯的民国政府失去了信心，辞去了一切公职，在天津蛰居，过着不问政治、专心著述的生活。虽然著作成果颇丰，但并不足以让他真正满足欣慰。身虽不在政治场中，但他的心却从来不曾离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当年同生共死的老师康有为截然不同的是，梁启超在经历了几年的游历观察思考后，思想认识已经顺应历史的发展，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转而拥护民主共和。所以就在1915年的夏秋之际，当得知袁世凯逆流而动，企图以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开始筹划称帝活动时，他怒不可遏，毫不犹豫地中止了《战争哲理》的写作，连夜撰著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一系列文章，戳穿了日本人的谎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



惊世怪才梁启超

在“二十一条”秘密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当局及舆论所怕的不是袁世凯手中的百万军队，而是梁启超手中的一杆笔。他们无法正面回击梁启超，只得不分官员还是文人，凡是和梁有点交情的日本人，都接踵赶到天津来拜访他，明是叙旧，实为意图收买。一时间，天津梁家这座小洋楼比堂堂民国的外交部还热闹。梁启超毕竟是经过大风浪见过大世面的，无论对方或明或暗，或软或硬，一概以礼待之，既不失名士风度，又立场坚稳，态度明确：“尔等视大和民族为大和魂，我视中华民族为中华魂，其理相同，梁启超何等人哉？或毁或誉均是等闲，唯中国人耳，唯珍我惜我中华魂耳，果有直言且还将直言，请谅之。”

梁启超在为中国发言，不只为了国家的主权，更为了国家的尊严。

然而维护了中国的权益，自然就会得罪日本人，眼看“买卖”要被搅黄，卖家袁世凯肯定坐不住了。梁启超的名头太大，当年对付宋教仁的那手暗杀伎俩，袁世凯不敢再用，况且也着实不忍失去这位大才子。他只得把自己的得力幕僚也是梁启超的老朋友杨度派到天津意租界梁宅来，让他哄哄劝劝这位舆论大佬，最好能把他一起拉进自己的阵营。

梁启超自然不为所动，直言共和国体、宪法制度不容变更，自己已经决意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帝制，支持民主共和。

杨度之访，无功而返。

袁世凯终究不顾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接受了“二十一条”，并且更加紧锣密鼓地谋划筹备其登基称帝的“大事”。期间他几次向梁启超示好抛绣球，许以高官显爵，梁启超均避而不就。然而眼看袁世凯的伎俩不断祭出，复辟称帝势所难免，身在天津寓所的梁启超忍无可忍，不断写出批驳谬论的文章，以自己最强有力的方式攻击袁世凯的凶险野心。这其中，就包括了那篇轰然震响、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不用复述此文的内容，不妨看看各方观后的反应：文章做成

那天，刚好袁世凯方面又从北京派梁的得意弟子汤觉顿到天津来笼络梁启超。和一般人面对强敌迂回突袭的策略不同，梁启超的书生意气和名士脾气让他直接将此文和一封致杨度的绝交信交给了汤觉顿，让他带回北京。杨度一看，顿觉大事不好，赶紧奔往中南海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看后，后背直冒凉气，想出了拿钱摆平的主意，他借给梁启超祝寿为名，派人专程送去20万大洋的寿仪，企图收买梁启超不要发表此文。梁启超完全不为所动，婉言谢绝并退回了这份“寿礼”，同时还回赠了亲笔抄录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给袁世凯，以示光明正大、不予苟同。

20万“袁大头”是个什么概念？以现今的币值，一块大洋当在数百甚至上千块人民币，梁启超不为金钱所动，毫不犹豫地与袁决裂。

1915年9月3日，这篇牵动袁世凯“君臣”脆弱神经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北京《京报》上赫然刊登，敲响了破袁帝梦的丧钟。当天，《京报》即被抢购一空。“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人接踵至该报馆请求再版。”后来报价涨到“每份三角”，而求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次日，《国民公报》转载，至销售量大增，“为向北京报纸所未有”。直到9月6日，求购者仍络绎不绝，报社方面只好在7号将这篇大作印成单行本发行。文章发表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一时间，传遍全国各大城市，轰动中外，传诵一时。

此后，天津意租界民族路梁启超寓所中的书房里不断发表出言辞犀利的文章，将袁世凯一伙的帝制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其实可以说，护国战争在这片战场上，早已硝烟弥漫了。

## 四

当年戊戌变法的惨败，让梁启超明白，政治绝不只是思想之争、制度之争，更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实力之争。笔杆子可以逞一时之快，真正的大势，终究还是要靠枪杆子来决定的。1898年



惊世怪才梁启超



蔡锷将军

的惨败，他输就输在袁世凯身上，输在了秀才造反，只会动口，没劲儿动手上，赔上了令他一生痛惜的挚友谭嗣同。到了这十几年后的第二回合，更成熟更坚韧的梁启超岂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这一次，他的搭档换成了另一个让他终生感佩之人——他的得意学生蔡锷。

所谓名师出高徒，蔡锷其人，思想之明睿深透、人格之醇厚感人、才华之溢扬

恣肆，可谓文武全才、一世人杰，每每让人感觉类似《三国志》中周瑜和《三国演义》中常山赵子龙的结合体，实为民国时期一颗划空而过的耀眼明星。当年在梁启超的学生之中，他是身形最瘦弱的一个，但这个胆色志气不形于色的男人，出乎老师意料地执意学兵家。留学日本归来，蔡锷马上成为中国军界不可多得的俊才，出任云南督军，并很快被袁世凯召至北京自己身边，一来实爱其才，指望其成为左膀右臂；二来也着实担心这样的狠角能量太大，放在地方早晚成为劲敌。

护国运动的上半场，老师已经唱得风生水起了，不过袁大总统无意罢休；下半场，学生登台，师徒联袂解决战斗。

其实，蔡锷到了北京，就是老师的卧底了。他时常借医治喉疾之由到天津，向老师汇报袁世凯方面的内幕动向，梁启超只是不断提醒蔡锷“不动声色、深自韬晦”。此时的梁启超最明白不过，蔡锷是他手里必不可缺的杀招，恐怕也是唯一可靠的杀招，不到时候绝不可有一丝暴露，真正出手之时才能有雷霆万钧、迅猛制胜之效。

到了袁世凯称帝大势无可避免之时，梁启超、蔡锷急需在天津

会面定策并奔赴南方发动护国战事。于是，蔡锷为国牺牲，开始了“八大胡同一月游”，这才造就了蔡锷与小凤仙的一段风流逸事，制造出袁世凯对蔡锷的一点点放心和松懈，于是将派到他身边的四名密探减少到两名。之后蔡锷又设计出必须到天津的日本人医院治病的假象，使得他可以有个说得过去的幌子，移师天津，与坐镇民族路的老师梁启超共商护国大计。《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这样的讨逆檄文，其实都是在这时的天津寓所完成的。

在天津定好此后的种种军事计划后，师生二人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立即宣布独立。

1915年12月2日，蔡锷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改名换姓穿上和服，坐日本轮“山东丸号”东渡日本，后经多地转站，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而为了掩护爱徒成功抵达目的地，梁启超一直冒着巨大风险在天津寓所按兵不动，借以迷惑并稳住袁世凯方面。直到12月18日，他才借口赴美就医，从天津港坐船抵达上海。师徒二人一文一武，一张一弛，共同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的序幕。

纵观后来护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蔡锷固然是救世英雄的标志人物，但以实力而论，蔡锷可以掌控的云南一省，护国军不足一万，面对的却是袁世凯的全国军队，光是先头部队就是十万精锐北洋军。然而最终蔡军胜而袁军败，中间的关键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和一个梁启超了。战争打响之前，蔡梁二人就很清楚之后会面临什么局面，真正硬碰硬地拼杀，他们是毫无胜算的。所以早在天津，他们就定好了云南独立，之后策动贵州、广西，攻取四川、广东，进而带动全国大势的策略。而之后战争的进程，正是按照这个剧本发展下去的。所以可以说，护国战争之胜，政治为主，军事为辅。蔡锷打的几



惊世怪才梁启超

013



京城名妓小凤仙